

构建泛在可及终身教育体系研究(笔谈)

贾 炜 吴遵民 乐传永 吴 砥

[摘要] 2025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下文简称《纲要》),提出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国家为什么提出构建这一教育体系,基于怎么样的现实考量,如何理解这一教育体系的基本内涵,如何建构这一体系,将面临什么问题和挑战等,这些都是贯彻和落实这一战略目标需要先行思考清楚的。基于此,编辑部邀请了上海开放大学贾炜校长、华东师范大学吴遵民教授、浙江台州学院院长乐传永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部副部长吴砥教授展开访谈。我们期待,嘉宾的观点能给终身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者带来启发,进而激发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和思考。

[关键词]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泛在可及;终身教育体系

[中图分类号] G7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79(2026)02-0004-09

一、缘由与背景

贾炜:《纲要》明确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精准回应了我国社会当前一系列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一是社会转型加速演进。我国正经历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深刻转变:2024年居民消费额较2010年增长2.72倍,消费结构已迈入富足型阶段。物质供给的极大丰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与体验空间,叠加日趋扁平化的社会结构和“加速社会”的高频节奏,共同催生了更加多样化与个性化的价值追求。

二是经济基础日益坚实。2025年,中国GDP全球占比升至19.4%,人均GDP年均增速达5.5%,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我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关键赛道“领跑”或“并跑”,跻身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知识、技术、数据等新型

生产要素牵引作用明显增强,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迭代提出了刚性要求。

三是人口素质持续提升。2023年我国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1位,比2012年上升28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2024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升至60.8%,进入较高普及化阶段,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4年,提前达到OECD国家水平。目前,中国人才资源总量、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研发人员总量均为全球最高,国民文化素质显著提升,驱动学习需求向更高层次、更具品质、更能实现自我价值方向升级。

四是老龄化挑战加剧,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5.6%,占全球同年龄段人口的27.4%,明显高于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17.5%),同时平均预期寿命逼近80岁。在延迟退休改革、银发经济兴起及社区治理深化等多重背景下,如何通过“老有所学”赋能“老有所为”成为教育资源供给优化的重要课题。

[收稿日期] 2026-02-11 **[修回日期]** 2026-02-26 **[DOI编码]** 10.13966/j.cnki.kfjy.2026.02.001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支持学生创新思维培养的数智化学习场景构建研究”(A2023001)。

[作者简介] 贾炜,上海开放大学校长;吴遵民,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乐传永,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台州学院院长;吴砥,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部副部长。

[引用信息] 贾炜,吴遵民,乐传永,吴砥(2026). 构建泛在可及终身教育体系研究(笔谈)[J]. 开放教育研究,32(2): 4-12.

五是知识更新加速。数智时代学科边界日益模糊, 知识传播呈现高度网络化特征, 个体兼具知识消费者与生产者双重角色。数据显示, 仅在B站就有超2亿人进行泛知识学习, 且近90%的知识类内容由非专业机构(自媒体)生产。这一趋势迫切要求构建能够支持多元参与、即时交互与协同创新的教育服务新生态。

这些深刻变化共同构成了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现实逻辑, 也为开放大学重塑服务定位、担当时代使命提供了更清晰的指引。

吴遵民:《纲要》提出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①, 不仅体现了终身教育体系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同时也凸显了其面向全民、面向未来的前瞻意蕴。

众所周知, 现代终身教育理念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法国成人教育学家保罗·朗格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届国际成人教育促进会”上以终身教育为题作了报告, 并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思潮、一种意义深远的理念及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在全世界得到推广(吴遵民, 2010)。该思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传入我国, 终身教育理念的中国化之路亦随之开启。

经过约四十年的持续演进, 当下终身教育理念已深入人心。然而, 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仍多止步于宣传或政府文件中。教育资源的统合与共享依然面临各种障碍, 终身教育所产生的动能亦未能转化为普通民众的切身体验。在此背景下, 如何把空泛的教育理念落到实处, 把终身教育思想产生的巨大动能化为推动社会进步、赋能个体成长的强大动力, 国家的顶层设计、具体政策的制定及重大方针的引领无疑至关重要。《纲要》把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目标置于突出的战略地位, 其真实意图是通过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与贯彻落实来切实提升国民素养、加快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大国的建设。

乐传永: 国家提出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 至少可以有三重理解:

首先, 它是彰显时代属性的。“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离不开“当代中国”的时代语境。“当代中国”是时代定位, 引领教育发展的方向, 强调系统性与集成性。作为“八大体系”之一, “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不仅突出自身体系的建

设, 还与其他教育体系保持协同发展与联通。“当代中国”也是发展环境, 它涵育新兴的教育思想, 强调创新性。“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是对当代中国教育实践的深刻把握与呈现, 是对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新认识、新尝试,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其次, 它是面向社会现实的。“面向社会现实”是理解该体系的核心点。一方面, “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契合教育现实, 尤其能回应当下的教育问题与教育需求。换句话说, 该体系是对“能不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和“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的回应。它彰显出鲜明的属性属性和人民属性。另一方面, 该体系反映出社会现实的“大盘”, 与当下经济转型、人口结构变化、数字技术更新、民生发展等保持高度的协同。

再次, 它是承续历史经验的。“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的提出不是“空中造楼”, 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基础的。从国家政策看, “大众化、社会化的终身教育体系”“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等在已有的政府文件中都有提及, 成人教育体系、继续教育体系等也屡见于政策文本。从学界讨论看, “终身教育体系”的探讨至少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集中且深入的学术研究是在新世纪后, 这些思想观点也是我们深入认识它的学术资源。因此, “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的提出是有历史渊源的。

二、发展历程

吴遵民: 我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从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②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并把“构建终身教育体系”^②作为重要任务开始; 党的十七大报告继续将“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 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③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 2010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强调“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 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④(由此建构形成“双体系并列”框架)。这些表述虽然在政策文本上确立了终身教育地位, 但认知层面仍存在局限, 即将终身教育狭隘地理解为“学校教育以外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活动”。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学校中心论”的思维定

式, 将终身教育视为国民教育体系的补充而非统合, 由此亦导致制度设计、资源分配和实践推进中出现体系裂痕、职能交叉和认知模糊等问题。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该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⑤。这一表述具有三重意义: 一是从根本上打破了“双体系”并列甚至对立的传统框架, 将学前教育、学校教育、继续教育等全面纳入统一的国家教育体系。这也意味着终身教育不再被视为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教育, 而是贯穿人一生、覆盖全社会、统合各种教育活动的完整教育生态。二是明确政府责任的主体性, 强调“服务”这一核心概念, 突出了政府在体系构建中的主导作用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责任。政府也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育管理者, 更是学习资源的整合者、学习机会的提供者和学习环境的营造者, 其职责在于保障每一位公民在不同人生阶段都能获得公平、优质及可选择的学习支持(杨绿等, 2025)。三是推动政策视角的转换, 即从传统的以“教育”供给为中心转向以“学习”需求为引领, 凸显了以人为本理念。政策关注点亦从“我们提供什么教育”转向“民众需要什么学习”, 强调尊重学习者的主体性、多样性和选择性, 由此体现了教育政策的人民性和服务性特征(杨绿等, 2025)。这一转变不仅意味着国家教育治理理念的深刻进步, 也反映出从制度建构走向人的发展的价值回归, 同时为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型社会奠定了政策与理论基础。本次《纲要》提出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目标, 可被视为是上述政策理念在取得高度共识后, 如何从实践视角深度探讨终身教育体系从理念走向现实的路径选择。

概言之, 现代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已经从最初的以学校教育、终身教育并重的 1.0 版, 逐渐演变为以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现代教育体系”的 2.0 版, 最后发展到融入“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思想理念与实施原则的 3.0 版。

乐传永: 从学术视角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有学者就此展开探讨, 九十年代国家政策开始提倡, 特别是 1995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将“终身教育体系”列入其中, 凸显其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那么, 历经数十年的实践探索后, 终身教育体

系迄今达到什么水平? 这可从制度建设和实践创新维度加以判断。

在政策制度建设方面看, 我国很多政策文件都将终身教育体系纳入其中, 如《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 2010 年发展规划》《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修正案》《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报告等。可以说, 国家始终重视终身教育体系构建。遗憾的是, 一方面, 国家一直没有出台专项政策推进终身教育体系构建, 使其处于相对弱势处境; 另一方面, 制度建设, 尤其是尚未形成以国家为主的资历框架建设机制, 以及学分银行、学习成果认证机制等, 使得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内核——互联互通, 掣肘其整体的进展。近年来, 上海、浙江、安徽等省(市)推进学分银行建设, 值得大力推动。地方“先行先试”, 国家“谋定而后动”, 这或许是符合国情和发展实际的可行路径。

在教育实践方面, 终身教育体系建构基本上局限在成人教育领域。这可从两个层次分析: 一是狭义的终身教育体系, 比较突出的是, 国家开放(老年)大学系统形成的由国家到县市为主的实践体系, 部分省市形成省—市—区(县)—乡镇(街道)—村居委为主的多层级社区(老年)教育体系。然而, 成人教育类型复杂、层次多样、序列多元, 因此综合性的体系化建设实际上还有推进、创新的空间, 尤其是不能仅把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放在“顶层”, 放在“上面”, 而要转变思路, 把眼光向下, 看到基层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创新优势和潜在空间。也就是说,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推进教育体系建设的力度、深度还不够。二是广义上的终身教育体系, 即从“大教育观”的视角看, 融通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的体系构建还处于起步阶段。各类型教育体系基本上还处于“各干各的”状态, 互联互通、协同发展成效不理想。但基于数字化的教育融合、代际学习以及“三教融通”“职普融通”“职继融通”等创新实践, 正在更新人们对终身教育体系建构的认识。

三、主要内涵

贾炜: 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尤其在人工智

能竞速发展的当下,“泛在可及”所呈现的未来图景不仅是学习资源的无边界、广覆盖、即时性、有效性,更是学习资源供给过程中所形成的主体多元、形式多样、基建完备、生态健康的社会学习环境。因此,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本质是社会教育,其目标指向的是普惠性、发展性和社会治理效应,主要包含三方面:

一是资源供给主体多元协同、角色互嵌、边界消融。资源供给主体将由人类中心转向人机协同,由学校、企业和社会的组织行为转向个体参与知识生产与传播,由供学分离转向供学双向转换。

二是教育方式以需定供,体现出高度的专业化、个性化、灵活性。作为泛在可及终身教育体系的主干,开放大学需率先打破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边界,不仅要把学校办在社会中,更要转型为服务学习型社会发展的枢纽平台,在筑牢大学属性的同时,强化优质学习资源在全社会的配置功能、教育科技应用示范引领功能、应用技能型人才培养功能和开放教育门户枢纽功能,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组织系统、话语系统、评价系统、运营系统,释放和提升服务终身教育体系的整体效能。

三是学习价值从“工具思维”转向“人本思维”。主动且善于学习是人类社会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类持续进化、不断进阶的重要基础。推进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需确立“学习者发展优先”的终身教育理念,这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理念的进阶思考,最终目标是推动学习与人的生存、生活、发展的深度融合,支持个体在学习实现价值和创造意义。

吴遵民: 如何理解《纲要》提出的“泛在”“可及”? 我以为,“泛”指向教育资源的丰富与浩瀚,它可以是线上的,也可以是实体的;“可及”侧重制度保障、机制建设和贯彻落实。“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核心是通过技术赋能和体制机制创新达成理念的落地。但我们也要关注“泛”字的负面含义,即空泛与宽泛、“华”而不实、“泛”却不及。简言之,“泛”字既凸显了终身教育发展的成果,同时亦点出当下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问题,目的是要致力于让终身教育思想通过体系构建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及帮助个体实现生命成长及终身发展的具体行动。

乐传永: 理解“泛在可及”可抓住以下几点:其一,“泛在可及”是新时代“终身教育体系”的核心标识和特征体现。每个阶段、每个时代都有相应的话语表达,这源于对时代诉求、实践需求与人民需要等的综合反映。“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泛在可及”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话语,更意味着一种更具超越性的终身教育体系设想和图景需要生成和实现!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在生成观中理解“泛在可及”。有了这种生成观,我们才可以看到“泛在可及”在终身教育体系建构中的时代性、历史性和过程性。其二,“泛在可及”内含强烈的数字属性。作为数字时代的表达方式与理想状态,“泛在可及”绝非“泛在”与“可及”的简单叠加,其背后有区别于传统观念的新根基、新指向,即数字化。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是“泛在可及”得以落地的关键支撑。抛开数字化谈“泛在可及”,恐怕是立不住脚的。

“泛在可及”还意味着走向实践、走进群众。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泛在可及”的人本性、人民性,这是超越词源、技术意义的理解。一方面,从宏观设计转向微观落实,在实践层面指向学习资源、学习机会等的可获得、可接触、可适配,符合“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之义,保障每个人的学习权利。另一方面,“泛在可及”内含“走进群众”,把学习理念变为学习实践。

从教育体系上说,理解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需要把握好“六大特质”和“八大体系”。从“六大特质”的角度看,该体系着重关注人才竞争力、民生保障力和社会协同力。首先,我们目前都在正规教育体系中谈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往往忽视了社会人才的继续教育问题。该体系可以说“补了短板”,为校外人才培养提供了保障。这是持续保持人才竞争力的关键力量。其次,该体系还关涉民生保障,有很强的民生属性,回应了人民群众对更加公平、更加优质、更加普惠性教育的需求。再者,这一体系涉及多类主体,需要社会协同,即它内含“央地、府际、社会力量”等多方主体、资源的互联互通。

从“八大体系”看,一是差异性。“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必然区别于其他体系,尤其是基础教育体系、高等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体系。那

么,这一体系究竟对应哪一块、哪一类教育?我认为,它的着眼点应放在非正规、非正式教育,或者说成人教育方面。这不意味着理解弱化或者压缩,而是从实践推进角度寻找有力的“抓手”。二是彼此关联性。差异性促使我们“找准定位”、发现优势,不能以割裂的、孤立的思维理解该体系与其他体系的关系,尤其要认识它与基础教育体系、高等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体系的关系,即“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与之互依互存,都统一于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之中。

总之,“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或可理解为:以培养人为根本遵循,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支撑,衔接各类教育体系及其发展基础,以每个人的个性化成长为旨向,以便捷可及、普惠公平、高度适配、多元参与为基本原则,为服务教育强国建设而构建的现代化教育体系。

吴砥:国家提出“构建泛在可及终身教育体系”,是顺应教育数字化转型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战略选择,更是应对人口结构变化、产业升级需求与教育公平诉求的必然举措。其核心是从传统的、以学段和学校为中心的分段供给模式,转向覆盖全民、服务终身、能够灵活响应个体多样化学习需求的生态服务网络,本质是通过教育供给侧的系统性变革,让教育从“阶段性福利”转变为“全生命周期权益”。

“泛在可及”不单单指“无处不在”的物理覆盖,而指以学习者需求为核心的精准化、个性化供给,具体体现为“四个维度”的落地:第一,空间上打破校园、社区、职场的物理隔阂,既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地方终身学习网构建线上无边界学习空间,又通过社区教育中心、企业培训基地、乡村学习站点等搭建线下服务节点,实现“处处能学”的现实场景;第二,时间上突破固定时间的限制,支持工作日碎片时段、周末集中时段、节假日灵活时段等的灵活学习,满足职场从业者、全职父母、老年人等不同人群通过微课、直播回放、弹性学制等实现“时时可学”的需求;第三,对象上摒弃“一刀切”的供给逻辑,兼顾学龄儿童的拓展学习、青年群体的职业提升、中年群体的技能转型、老年群体的素养培育,尤其关注残疾人、农村留守人员等特殊群体的学习需求,通过适配性服务保障

“人人皆学”的公平权益;第四,资源上打通学历与非学历教育、正规与非正规教育的壁垒,整合高校课程、职业技能培训、文化素养课程、兴趣爱好课程等资源,形成可组合、可衔接的“资源超市”,确保“样样可学”的多样化供给。“泛在可及终身教育体系”既回归了终身学习“以人为本”的诉求,又通过资源均衡配置与服务精准适配,推动教育公平与高质量发展双向发力,为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筑牢根基。

四、目标与挑战

贾炜: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关键是要解决如何实现数字化、生态化、融合化、终身化的问题。数字化指构筑“精准智慧”的坚实基座,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升级智慧学习平台功能,为学习者的终身成长提供定制化、智慧化的学习支持,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统一。生态化指重塑“多元共生”机制,突破单一教育边界,通过系统运营与机制建构实现功能优化,在共同价值追求的引领下,形成开放协同的学习共同体。融合化指营造“无感融入”环境,构建资源普惠、学习泛在的“平的世界”,社群联结、情感共融的“湿的世界”,以及智能协同、无感衔接的“无缝世界”,实现学习体验零摩擦、认知零负担与情感零隔阂,让学习在共识与共振中自然发生。终身化指拓展“持续赋能”的成长价值,应对知识“半衰期”急剧缩短的挑战。终身化意味着打破学习的阶段性壁垒,推动在职培训、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等深度融合,构建服务全龄人群、全生命周期、全场域、全天候的终身学习体系,让学习成为支撑个人持续发展与社会活力迸发的核心动力。

吴遵民:众所周知,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组织倡导终身教育思想以来,该理念因与各国文化、教育、经济及各种社会内在因素变化的契合(陈峥等,2025)而受到世界的关注,但该理念的浪漫主义色彩及乌托邦思想要切实转化为大众的获得感十分艰难。我国在推进终身教育过程中亦经历了同样的历程。历经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在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乃至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及以技能培训为主的继续教育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教育资源,但这些资源如何转为大众“唾

手可得”的教育红利,迄今仍没有解决。泛在可及终身教育体系的提出,就直指上述弊端,说到底就是要破除旧有教育体制机制的陈腐与僵硬、各类资源拥有者之间的利益纠葛与经济纷争以及由此造成资源共享的人为阻隔与壁垒。无疑,要破除上述顽疾,持续深化改革,理顺“大业”与“小利”之间的关系,并以国家名义统整资源的有效分配与切实落地至关重要。

具体来说,需突破的难点是教育资源的聚合、融通及与需求者的精准对接,关注的重点在学校后的继续教育。就前者而言,难点在如何解决资源的释放及拥有者的经济利益分配;后者的关键是强化学校后继续教育功能的发挥。众所周知,学前与学校教育天然连接,学校初等、中等与高等教育亦自然融通,而学校后的继续教育如何继续发力,目前仍处在游离与困顿状态。

与制度化的正规教育不同,学校后的继续教育大都归于非正规或非正式教育。其涉及的对象庞杂、需求多样、条件各异,尤其在获得制度化保障的条件下推进难度极大。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规划》)曾提出,“加快发展继续教育”“继续教育应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的教育活动,特别是成人教育活动,它是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④。《规划》强调继续教育而淡化成人教育,目的是想理顺教育体制机制的关系,即把继续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制,使其与学前教育、学校教育相连。如上所述,继续教育虽归类于非正规或非正式教育,却最能实现泛在可及的目标。它包含多种形态、多种类型的教育活动,面向的对象与需求亦最宽广。学历提升、求职转岗的学历培训或职业技能教育,各种旨在提升生活品质的闲暇教育、老年教育、社区教育,乃至最近因适应时代快速变化而兴起的再补习热——“夜校”,无不继续教育的加持与参与,其重要性与不可替代性不言而喻。非正规、非正式的继续教育如何才能纳入“制度化”轨道,如何在国家教育体系的统一框架下,获得与正规的学校教育公平发展的机会,无疑是当下实现泛在可及终身教育体系的重点与难点。

“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要实现的目标

与愿景,用政策话语来描绘就是,建设一个覆盖全社会、全民及贯穿生命全周期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用通俗语言描绘就是建设“人人皆学、时时学、处处能学”的学习型社会。这里的“人人”,纵向可覆盖个体从出生到拐杖的整个生命历程,横向包括不同年龄、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经济地位的各类学习群体。“时时、处处”更指向凡有学习需要,即可提供教育支持或帮助。故构建这一终身教育体系意为每个人离开或结束学校教育后,无论在家庭生活、社区活动还是职业生涯中,但凡需要得到教育支持或获取学习资源,社会和政府就有义务、有责任尽力去满足。

乐传永:“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是理想的图景、追求的目标。它不仅涉及“体系”有没有构建、建得什么样等问题,还关涉“泛在可及”的实现及其程度,可用三个“大”来勾勒:

一是“大超市”,指向教育资源供给。教育资源是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基础,教育资源有与无、数量的多与少、质量的高与低、类型的单一与多元等会直接影响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及其实现程度。尤其是“泛在可及”的要求更凸显了教育资源供给的重要性。从理想层面看,“大超市”要保证资源数量充足,以数字化、纸质资源等形式保证人民群众随手可得,随时可用;有多多样性,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学习需求,实现资源可选的高度适配与个性化学习;保证有序性,确保教育资源用之有序,公平无碍。

二是“大平台”,指向服务载体建设。“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需要有载体依托,这一载体的建设规模、水平不仅关系受众范围,还影响学习者的使用体验。核心目标是精准对接并服务亿万民众的多样化学习需求。因此,它既需要扎实的实体建设,延伸到社区、乡村、企业等基层角落,打造便捷可及的线下学习空间;更要侧重创建数字化载体,依托大数据、互联网技术,打破时空壁垒。同时,“大平台”应凸显“无门槛”性,优化服务流程,简化操作界面,方便各类人群及时、免费(低成本)、自由地获取教育服务,真正实现公共教育的终身覆盖、全民覆盖、全程覆盖。

三是“大银行”,指向学习成果认证与转换。“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应互联互通,这就需

要权衡各方利益,衔接各方关系,实现各类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与转换。好的“大银行”要突出两点:一是可兑换,即学习成果可“交易流动”“成果流通”;二是无梗阻,确保可在“央地、府际及区域”流动,过程“流通无碍”。

吴砥:泛在可及终身教育体系应是“以学习者为核心、技术为纽带、制度为支撑、多元主体协同”的闭环体系,既具备“处处、时时、人人”可学的基础属性,更能通过技术赋能实现“精准可学、高效可学、持续可学”,其核心可通过“三层技术架构、四大功能场景”构建:基础支撑层以国家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为核心,打通多部门数据接口,实现学习者身份、学习轨迹、成果认证等数据的互联互通,为全链路服务提供数据底座;智能服务层依托智能体、知识图谱等技术,构建“终身学习智能中枢”,实现学习需求识别、资源智能匹配、路径动态规划等功能,可实时分析学习者的年龄、职业、知识水平等,生成个性化服务方案;场景应用层聚焦多元学习场景,开发轻量化、适配多终端的应用工具,覆盖移动应用、桌面应用等,满足各类场景的学习需求。

“四大功能场景”体现在:一是资源供给智能适配,即将资源拆解为“知识单元”供学习者自由组合,为学习者提供适配资源,如老年语音养生课、农民工短时技能微课;二是学习路径动态规划,即依托学习者画像技术与行为数据,由智能中枢实时调整学习路径;三是实践场景数字孪生,即针对医学、机械等领域构建虚拟实践环境,方便学习者通过虚拟现实沉浸式实操,破解“重理论轻实践”痛点;四是学习成果实时认证,即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存证系统,实现“学习即认证、认证即可用”。

实现这一体系面临四方面挑战:一是资源供给结构失衡,如优质资源过度集中于发达地区与高校,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资源较匮乏,且职业技能、老年教育等领域资源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多元需求;二是技术赋能深度不足,数字平台多停留在资源展示层面,缺乏智能推荐、学情分析、个性化辅导等深度服务,与数字素养较低的老年群体、农村居民等的适配性不够;三是制度壁垒未破,学分认证标准不统一、学习成果转换机制不健全,学历与非学历教育、线上与线下学习之间仍存在“信息孤

岛”;四是协同治理机制不畅,政府、高校、企业、社区等之间缺乏常态化合作机制,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格局尚未形成;五是保障体系支撑薄弱,终身教育经费投入偏低,师资队伍专业化水平不高,评估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影响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五、应对策略

贾炜:构建这一体系的关键是要锚定建设要求。从上海开放大学来说,我们要立足“功能性、平台型”的新型高校建设定位,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

一是构建开放教育服务新体系。重点是发挥开放大学在非全日制教育的牵头引领作用,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斜向到角”的立体化终身教育服务网络。“纵向到底”指要筑牢“市一区一街镇一居村”四级办学网络,加快区级终身教育机构建设标准研制,夯实区级终身教育阵地作用,指导激发居村学习点活力,确保优质教育服务能触达城市各个角落。“横向到边”指要发挥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开放大学校务委员会的体制优势,加强与政府各委办局、各行业企业、高校、社会的合作,指导区级终身教育机构成为学习型城区建设的枢纽平台,打造覆盖各类人群的学习服务场景。“斜向到角”指顺应自媒体时代的知识生产与消费模式,依托多样化知识类平台,探索资源共建、课程共享、空间共融等机制,发挥无组织的组织力量,通过有组织协同与无组织参与,构筑泛在可及的终身学习新生态。

二是激发终身学习发展新动能。这包括发挥好开放大学作为终身学习成果认证与转换平台的作用,促进学习者的自我实现;顺应终身学习需求的现代转向,驱动终身学习从满足生存性需求转向发展性需求,追求精神品质与自我实现;拓展终身学习的价值通道,助力学习者在畅通学历提升、职业晋升、社会上升通道的同时,实现“生活幸福通道”与“价值实现通道”的延伸;构建学习成果价值最大化的融通转换机制,加快拓展学分银行功能,推进学历教育、非学历培训、生活素养教育等学习成果之间的认证转换。

三是回应终身学习新需求,包括推进学历教育规模稳中有进,非学历教育规模突破性发展,老年

教育扩容提质;优化终身学习需求和能力监测,提供菜单式、定制化的精准学习服务,满足不同群体差异化的学习期待;聚焦民生需求和职业赋能,重点加强养老服务紧缺人才(如陪诊师、安宁疗护、免陪照护等)、基层社会治理人才(如社会治理创新)和产业技能人才(如工匠、在职人员技能提升)等项目建设;深化岗位能力导向的教学改革,推行“学创用评一体”培养模式,打造更高品质、更具温度的教育服务供给。

四是塑造开放教育数智化转型新形态,包括打造示范性数智创新载体,让技术成为教与学的“效率引擎”,推动教学从实体课堂向无界空间、虚拟实验延伸;升级“网圈展行 2.0”行动,将数智服务从专业领域延伸至生活场景,形成“需求发现—技术响应—价值创造”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推进全方位、全要素、全场域的教育形态变革。

五是打造终身教育协同治理新生态,包括推动区级终身教育机构深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网络,聚焦积极老龄化、社区可持续发展等关键议题,将终身学习体系打造为优化城市基层治理、提升市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支撑;主动服务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构筑长三角终身教育共同体,在教育数字化、老年教育、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等重点领域形成联动发展合力等。

吴遵民:推进终身教育体系的“泛在可及”,当务之急可以实施以下策略:

一是加强学分银行建设,搭建资源融通可及的“立交桥”。泛在可及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关键是集聚各类教育资源,搭建教育大平台,并通过具体政策及技术手段使之与每个学习者互联与互通。在理想样态的学分银行引导下,各类教育资源可便捷地通过技术路径为更多的学习需求者所获取,学习成果亦可通过学分银行的认定而获得社会认可,由此来实现资源的融通、开放与可及。

二是发展个性化继续教育,为个体终身发展提供支持。如前所述,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的关键在于发展学校后继续教育,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时候学校教育结束,什么时候继续教育就无缝对接,但谁来担当继续教育的掌门人和领头羊仍存疑。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固然都在积极参与,但开放大学应最具资格。开放大学的开放性、包容

性及刻在骨子里的“遗传基因”,将为继续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三是推进数字化赋能,构建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社会群体的继续学习需求大、内容各异,建设一个集聚各类教育资源、超大容量的国家级平台,也是落实泛在可及、精准服务的重要路径。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汇集各类社会教育机构的在线教育、终身学习、老年教育等资源,以及汇聚博物馆与图书馆等各类公益机构的教育资源。

汇集资源的最终目的是惠及个人,为此可以通过技术赋能,即通过“一根网线”链接千家万户。试想家庭情景中,孩子有兴趣需求,也有学业困惑;中青年有职业生涯发展需求,也有家庭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技能、知识更新的期待;老年人有养老保健、发挥余热、贡献社会的需求。这些需求皆可通过国家或地方终身学习平台给予精准定位、有效支持。

四是激活老年教育,推动娱乐性老年教育向赋能型老年教育转型。当前,部分老年教育仍停留在满足“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娱乐型”阶段,开设课程多以音乐舞蹈、体育、书法美术、戏曲表演等为主,未能充分体现教育赋能的功能。世界卫生组织 2013 年将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条件较好、健康状况良好的 60—74 岁群体界定为“年轻老年人”(young elderly)(韩翱翔等, 2024)。“新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感强,对再就业的学习需求旺盛。这要求老年教育朝“老有所为,老有所用”的“赋能型”方向转化。

总而言之,“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强调教育机会与学习资源的“泛与及”,“时时”“处处”“人人”。它不是一个口号,而是精准服务与对接各类群体的政策保障。学前、学校与继续教育需成为统一的有机整体,才能让更多学习者在新的终身学习生态中共享现代终身教育体系所带来的教育红利。

乐传永:“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体系之间相互关联,高校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

一是促进教育资源的多元供给。高校可依托学科、师资、课程等优势,将学历教育资源转化为终身学习资源,激发教育资源创生、流动、共享的

活力, 为群众提供高品质、多元化、可持续的学习内容, 筑牢泛在学习的资源底座。

二是助力培养终身教育师资。高校兼顾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基本职能, 完全有能力、有优势开展老年教育、社区教育等非正规教育领域的师资培养, 助力解决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中人手少、服务弱、质效低等问题。

三是发挥终身教育体系制度建设的策源功能。高校能有效开展终身教育政策、模式、技术研究, 推动学习成果认证、学分银行、学籍制度等关键制度创新, 为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提供智慧支持、经验支撑以及政策启示。

四是发挥高校的协同作用。在教育生态系统中, 高校有突出的“生态位”优势, 在教育实践中有显著的协同、引领作用, 也是联系各类教育主体的“枢纽”。它有足够的优势推动校地协同、校企合作、大中小学互动及区域联动, 破除教育类型壁垒、整合社会资源等, 从而在主体协同、关系联结、资源共享等方面助力这一体系构建。

[注释]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N]. 人民日报, 2025-01-20(06).

②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02-11-18(01).

③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07-10-25(01).

④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N]. 人民日报, 2010-07-30(13).

⑤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N]. 人民日报, 2019-02-24(001).

[参考文献]

[1] 吴遵民(2010). 现代国际终身教育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

[2] 陈峥, 于修德(2025). 迈向“学科化”: 终身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探索 [J]. 成人教育, 45(6): 12-23.

[3] 韩翱翔, 温勇, 宗占红(2024). 隔代照料对年轻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J]. 西北人口, 45(6): 114-125.

[4] 杨绿, 吴遵民(2025). 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理论探索、现实挑战与路径创新 [J]. 成才与就业, (16): 4-7.

(编辑: 李学书

采写: 徐辉富)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Ubiquitous and Accessible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JIA Wei, WU Zunmin, LE Chuanyong & WU Di

Abstract: On January 17, 2025,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Outline for Build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2024–2035)*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Outline), aiming to establish a ubiquitous and accessible system of lifelong education. To thoroughly understand and achieve strategic goals set forth by the Outline, the journal has invited a panel of experts (President Jia of Shanghai Open University, Professor Wu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Le, President of Taizhou University in Zhejiang, and Professor Wu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o share their unique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development process, core connotations, challenges, and pathways for constructing this system. We hope that the insights from these experts will inspire both theorists and practitioners and encourage more people to engage in discussion and reflection that will help us eventually achieve the goals established in the Outline.

Key words: *outline for build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2024–2035); ubiquitous and Accessible;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